

中国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多元建构观点 和相关研究

陈欣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费城 19104, 美国)

摘要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和整合, 构成了人的发展的新的环境。在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 与市场化相匹配的价值观(如竞争性、独立性、自我表现)和传统价值观(如社会关系, 服从集体, 自我控制)在人的社会和心理适应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整合也可能促进新的行为品质的产生, 有利于增强人们应对各种情境的能力。根据多元建构观点, 群体水平上的社会互动过程, 如同伴团体活动中的社会评价和反应及其对个体行为的调节, 在社会变迁和文化整合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中起着关键作用。群体中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的变化通过社会互动过程不仅会影响个体认知、行为和情绪的展现水平, 而且也影响它们的功能性意义。本文首先回顾这一领域里的主要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应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的多元建构观点。接着, 在对儿童独特的气质特征和基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方式考察后, 进一步从多元建构角度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包括专刊论文中报告的研究。最后, 本文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中国社会变迁; 人的发展; 多元建构观点

分类号 B849: C91

社会变迁对个体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在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Elder, 1998; Silbereisen & Chen, 2010)。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方式和具有独特的早期气质特征或倾向的人的发展无疑会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一问题正逐渐引起心理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关注, 并导致越来越多的研究(综述见: 蔡华俭 等, 2020; 黄梓航 等, 2021)。本专刊收录了新近产出的一批代表性成果, 涵盖价值观、道德、幸福、名字偏好、理想情绪、婚姻满意度、理性个人主义、功利个人主义等众多心理特征的变化。这些研究和此前的大量研究一起, 揭示了一个有关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的相对复杂的图景。本文提出, 理解这些复杂的变迁现象需要一个多元建构的视角, 同时把中国人的基本气质特征、传统社会化方式和社会变迁结合起

来考虑。下文在简单回顾这一领域的研究背景和理论问题之后, 对多元建构观点进行介绍并根据这一观点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加以讨论。在文末, 我将尝试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1 对社会变迁影响的探索、主要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应用的问题

从上世纪初开始, 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人员在不同地区针对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对社会变迁和个体行为和心理功能的关系开展了一些大型研究, 同时从不同角度对其中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了解这些研究项目的背景、要解决的问题和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近一百年前, 鲁利亚和维果茨基等人在乌兹别

克斯坦的村庄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山区牧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考察了苏联革命成功后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Luria, 1976)。这些地区的农民和牧民传统上从事着无组织的分散的活动,但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如扫盲班和集体讨论制定生产和工作计划。研究人员发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这种重大变化改变了个人的社会交往和生活经历,同时促使人们产生了新的知识形式和思维方式。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些农民最初的思维更多的是具体形象思维,受限于直接的物体特征和对现象的感性认识,但在集体农庄(集体农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工人和参加短期教育项目的人表现出更多具有逻辑性的中介和抽象思维。沿着这一研究传统,心理学家后来在非洲、南美等地区考察了商业活动、正规学校教育和城市化对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学习过程和认知能力的影响(如 Rogoff, 2003)。

另一项有关社会变化的大型研究是社会学家 Glen Elder 参与的在美国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几个追踪项目。这些项目起初并没有涉及社会变迁,但项目中的被试在不同年龄阶段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在大萧条中,全球股市金融危机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家庭经济困难,进而导致夫妻之间产生矛盾,削弱家庭的正常功能,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Elder (1974)从生命历程(life course)的角度分析了大萧条对家庭和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揭示了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和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如参军,入学)在困难条件下如何交互作用,从而决定人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化所提供的机会和个人的选择往往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比较近期的一项有关社会变迁的有影响的研究来自于 Rainer Silbereisen 和他的团队。他们考察了东、西德合并后的社会经济系统(如福利制度)的变化对青少年的观念、行为和适应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东、西德和东欧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的共同点是有一个激进但不持久的过渡,首先是政治制度和基本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之后是一段较长的转型期,重新建立经济、教育和福利等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转型过程常常伴随着失业率的增加和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从而影响家庭和青少年的职业计划和选择、生活适应、价值观、行为和心理健康。个体对挑战的应对策略,如主动控制(积极努力解决问题或初级控制)、寻求社会支持

(次级控制)和回避与退缩作为重要的中介机制或调节机制直接影响个体的发展结果。

关于社会变迁和个体发展的理论, Urie Bronfenbrenner 后期的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从多层次的环境系统角度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框架。根据这一理论,儿童处于多个环境系统的中心,包括家庭和同伴等直接环境,社区和大众媒体等较间接的环境,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宏观环境。与社会变迁有关的一个系统是时间系统,指生态环境在生命过程的不同年龄段中的连续和变化。时间系统包括一个人生命周期的内在发展和家庭结构和条件(如就业状况)的变化,同时也包括了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历史事件。对社会变迁和个体发展的关系更为直接的讨论有 Elder 的生命历程理论、维果茨基的历史文化观点和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和观点对于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过程和方向的描述有着很大的差异。

Elder 的生命历程理论(1974, 1998)以及与之有关的 Rainer Silbereisen 的社会变迁中的应对模型(2010)主要关注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危机对家庭和个人在心理适应和健康上的负面影响。Elder 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生命历程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历史时空原则(historical time and place),即人的一生在特殊历史时期和地点的经历塑造他/她的个体生命历程;(2)生命中的时机原则(timing in lives),即社会变迁或事件在一个人成长中所发生的时间(如儿童还是青少年时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发展的影响有多大;(3)相互关联原则(linked lives),即生命的各方面相互依存,社会和历史的影响通过这种相连的关系网络来表达;以及(4)人的能动性原则(human agency),即个人在历史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制约中通过选择和行动构建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原则可以应用到不同类型的社会变迁情境中。胡洁和周晓虹(2024)的文章通过分析个人在改革开放期间的生命史的话语叙事讨论了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到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世界和行为。张良和张文新(2024)的研究广义上也可看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一系列事件(如高等教育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城乡高中生的教育效用和教育志向的影响。但由于 Elder 的研究背景是家庭和儿童青少年在经济大萧条中的困难经历,这一理论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

动荡和危机时如何寻找、选择、抓住和利用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减少大环境的负面影响而正常发展。Elder 在研究中的确发现一些家庭和青少年发展的积极的一面,如在困难时刻家庭关系(如母女关系)更加亲密,有些青少年更早的成熟,但生命历程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不够深入。当然,任何情况下,机会总是有的,个人的态度、能力和行为也很重要;但总体来说,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机会是不多的,而个人“能动性”所能起的作用也就有限了。这一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一定完全合适。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十多年前 Rainer Silbereisen 和我讨论设计一项有关中国社会变迁对儿童和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式是在 Elder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和他的团队所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测量社会变迁对父母和青少年带来的挑战、困惑、焦虑等方面的反应以及父母和青少年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策略。当我向他提出增加一些社会变迁的“正面”影响时,他感到非常吃惊。最后我们重新制定了一份中国父母的关于社会变迁(特别是和工作有关的过去 5 年变化)的认知和态度的量表(Chen et al., 2010),包括 5 个维度:(1)与工作有关的风险和困难(例如,“当我回顾过去 5 年,我现在失去工作的风险更高”);(2)与工作有关的机会(例如,“我现在的工作向我提供了更多高级培训的机会”);(3)工作中的自我提升(例如,“我目前的工作需要我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知识”);(4)高科技经验(例如,“新媒体和通讯技术让我获得更多知识”);以及(5)新的价值观和知识(例如,“我父母的知识经验已经不适合我的今天生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父母认为社会变迁带来的风险和机会大体相当:在 1 (非常不符合)到 5 (非常符合)量表上平均得分都在 2.5 左右;社会变迁促进了自我提升和使用高科技的经历,平均分 2.86~3.67;认为社会变迁带来新的价值观和知识偏低,平均分 2.29~2.48。此外,城乡比较发现,相比农村父母,城市父母认为社会变迁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需要更多的自我提升,城市父母比农村父母有更多的高科技体验。关于社会变迁和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显示,父母在机会和前景方面感知到的积极社会变化预测了温暖态度和鼓励儿童独立和探索,认为社会变迁带来更多机会的父母更可能鼓励他们的孩子学习独立和探索的能力和行为,并在教养

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亲切和温暖的方式。这是一项十几年前的研究,这期间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知和态度及其与教养方式的关系可能发生了变化。但这项研究说明,Elder 和 Silbereisen 等人集中在社会变迁对父母和青少年带来的挑战、焦虑和困难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策略的这一理论框架,其中有些部分(如个人在历史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制约中的能动性)对于中国心理学研究和应用也许有一些借鉴意义,但总体来说不一定适合中国(以及越南、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的情况。

维果茨基在前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文化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有价值。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苏联早期的集体化体制变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的变化性质不同,因而社会变迁对人的影响的方向、过程和机制会有差异。其次,维果茨基的理论着重阐述社会变迁对人的认知能力(如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影响,目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对人的影响可能在社会能力和心理健康方面更明显。其实,维果茨基和鲁利亚的研究存在争议,学术界对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甚至社会变迁对人的基本认知能力的作用是否有像他们认为的那么显著存有疑虑。再次,维果茨基理论总体而言强调的是人从“低级”到“高级”心理活动水平的“线性”变化,而社会变迁的影响也许比这一模式更为复杂(蔡华俭 等, 2020; 方文, 2008)。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2009)在一定程度上与维果茨基的理论一致,尽管前者关注的社会变迁和苏联早期的变化完全不同。Greenfield 提出,随着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形式的变迁,人的认知和行为也发生相应的变化。Greenfield (2009)将社会人口学特征、学习环境、和人的发展途径联系起来,考察了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变迁的趋势。她用两种类型的环境——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 来描述社会的特征:Gemeinschaft 指乡村生活,物质资源为主要劳动资源的经济,使用简单技术,无正规教育的社区;而 Gesellschaft 指城市生活,工业化经济,使用复杂技术,有系统的正规教育(如学校)的社会。尽管 Greenfield 自称对社会变迁的方向不做任何假设,但她认为从过去、目前以及未来全球变化的趋势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在从 Gemeinschaft 向 Gesellschaft 变化。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则是从集体主

义向个人主义变化,作为社会变迁影响人的发展的中介,前者促进带有情境性特点的认知和合作行为的发展,而后者促进抽象认知和独立行为的发展。Greenfield 的理论(2009)似乎对中国当前的有关社会变迁和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期多篇文章采用她的观点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张明杨 等, 2024; 王祥坤 等, 2024; 吴胜涛 等, 2024)。应该指出,由于这一理论强调社会人口学特征(经济,技术等)和文化价值观与人的学习环境的联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具有很明显的单向“线性”的特征。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将不断的“西化”或“美国化”,文化价值观从集体主义变向个人主义,社会责任感、人际合作和自我控制行为也相应地逐步减少,而独立和“自我中心”行为会逐步增加。在一次和 Greenfield 的交谈中,我曾问她,这一理论如何预测美国未来的变化。她认为,美国文化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美国人的独立行为会更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趋势至少在较长时间内会一直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步伐。

2 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多元建构观点

Chen (2012, 2015)针对当代全球化和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化和人的发展的影响提出多元建构观点(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中西方有关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讨论,尤其是有关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经常涉及到多元共存和整合或建构的思想,但在心理学领域,如何从多元建构的角度来探讨在社会变迁情境下的社会化和人的发展过程并不清楚。Chen (2015)认为,国内和跨国人口流动、信息技术和通信的进步和跨区域经济和文化体系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融合,由此构成了一个人类发展的独特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人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关于行为的规范、标准和价值观。这些行为规范、标准和价值观有些是一致的,有些是互补的,有些可能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在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市场化的环境会要求年轻一代更多地表现竞争性、主动性、探索性、独立性、有自信心和自我表现以取得更大的成功,而这些要求和传统的价值观几乎完全相反。与此同时,Chen (2015)认为,传统文化中所要求和推崇的行为品质,如自我

控制、服从集体、社会交往中讲究人情关系等,也许会有所减弱但不会消失(蔡华俭 等, 2020)。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共存并不是简单的聚集和混合,比如来自其他社会(如西方社会)的文化可能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但它们不太可能不加修改地被完全采用。有些个人主义价值观(如冒险精神,个人表现)甚至和中国人的气质特征(如害羞,谨慎,依赖家庭和团体)不相契合(poor fit)。社会变迁使得具有这些气质特征的人可能在社会和心理适应上出现困难。从长期的社会发展来看,对不同价值观有目标地选择和有机组合,逐步形成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的文化环境将有利于各种气质特征的人既能表现有竞争力实现自我目标,也能够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可期待的发展方向。

多元建构观点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共存和融合的基础,在于它们在人的适应和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或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独立自主和群体取向的价值观的功能有重叠和一致的地方,但相对而言,独立自主的价值观更有利于在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获取成功,实现个人目标。而群体取向或社会联结或归属(social connectedness)的价值观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和维持社会支持系统,更有益于心理健康。Kağıtçıbaşı (2012)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相应的生活方式允许个人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这种社会变化并不一定削弱人们对社会支持和相互依赖的需求。因此,在各种价值观之间保持平衡,通过个体和社会水平上的建构过程,帮助儿童青少年学习不同的行为,在追求个人独立性的同时维护团体和谐,是培养比较全面的社会能力并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此外,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和整合有可能促进新的行为品质的产生。Kağıtçıbaşı (2012)提出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能够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建构自主-联结(autonomous-related)自我概念和相应的行为。从这一观点来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共存和融合也有利于其他社会(包括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儿童青少年的社会能力和心理健康的正常发展(Tamis-LeMonda et al., 2008)。这是多元建构观点和维果茨基以及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

多元建构观点关注在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环

境中的社会化经历,可以大体定义为人们通过在多元环境中积极主动的群体和个体活动,产生新的行为和心理品质或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从而改变发展的途径和结果。心理学中的传统建构理论主要有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和学习理论。尽管两者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主动学习、对经验的加工和对知识与内在认知结构的组织(如同化,顺应,外部符号系统的内化,支架或合作性学习/scaffolding 等),认知能力或心理机能会从低级水平到高级水平发生转换,也都认为个体的“活动”和社会交往在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多元建构观点更加侧重于宏观的多元社会文化情境及相应的生活经验和学习在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作为建构的主要机制,特别关注个体和环境在群体水平上的交互作用。此外,这一观点认为多元建构的结果不仅体现在个体认知、行为和心理品质的变化和产生上,而且体现在对群体(如社区、家庭和同伴团体)的新的结构、运作方式、和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的调整和产生上。更重要的是,群体中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的变化会影响个体认知、行为和情绪的表现或展现水平(display),同时也影响它们的功能性意义(functional meaning or significance) (Chen, 2015, 2018; Chen & French, 2008)。

在多元建构观点的要素中,群体水平上的社会互动或交往(包括社会评价和反应)和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参与和回应,既是社会变迁中建构过程的主要方面,也是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机

制。例如,随着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的文化信念和行为准则,人们对社会互动中的个体行为的理解和评价标准也相应发生变化。曾经受到肯定的行为(如顺从,内敛)可能会得到负面评价,而曾经被忽视或者不容许的行为(如冒险,自我中心)可能被容忍甚至鼓励。当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表现这些行为时,别人就会作出特定的反应(批评,漠视,称赞等),而且逐渐表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拒绝,排挤,接纳,在团体中地位的升和降等)。社会评价和反应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行为:正面的社会评价和反应示意这种行为应该保持和加强,而负面的社会评价和反应发出的信息是这种行为和目前的社会标准不相符合,应该加以控制和改变,否则会影响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和在团体中的地位。获得社会接纳、群体归属感和避免社会排斥的需要是人们主动地关注他人的评价并相应地改变自己行为的主要动机力量。研究表明,青少年尤其在乎同伴对他们的评价,而同伴团体对社会和文化的变化高度敏感,在同伴活动中体现的新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更加明显(Blakemore & Mills, 2014; Choudhury, 2010)。从儿童到青少年,逐步成熟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情绪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觉察、理解和回应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并主动积极地参与评价系统(如同伴团体的行为规范和标准)的建立、调整、改变和实施。

图1 情境-发展(contextual-developmental)模型是我们用于儿童发展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动态理论模型(Chen & Schmidt, 2015),它可以帮助我们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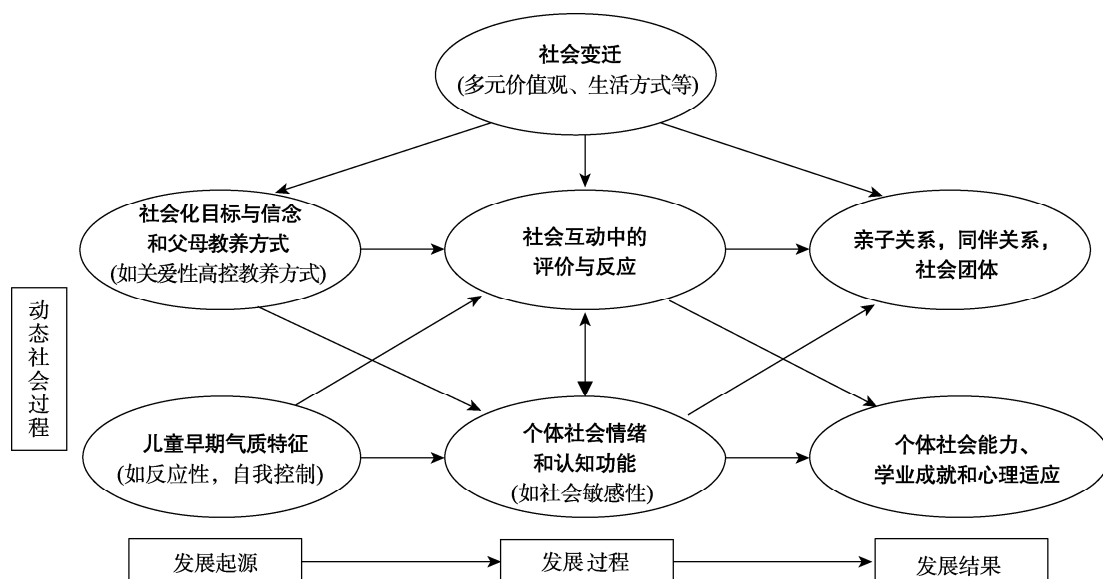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变迁和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的情境-发展观模型(Revised based on Chen & Schmidt, 2015)

更广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如何通过多元建构改变以儿童早期气质特征为基点和以传统社会化目标和方式为基点的发展图式,从而影响社会关系和个体发展的路径和结果。横向维度代表发展水平,纵向维度代表社会复杂性水平。处于中心位置的社会互动过程(社会评价和反应)在连接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它一方面反映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塑造个体行为、情绪和认知的展现和功能性意义。本文的以下部分重点讨论中国特殊情境中的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尽管目前的研究还不能提供社会变迁中多元建构的清晰的证据,但多元价值观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和发展的影响在近期的研究中逐渐有所显示。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一趋势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分析中国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问题和更有效地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在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对行为与心理特征的展现和功能性意义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有关中国儿童基本气质特征和传统社会化目标和方式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3 中国儿童气质特征和传统社会化目标和方式:社会变迁影响的基点

人的早期气质特征和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方式既是社会变迁影响的基点,也是社会变迁影响的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儿童表现出独特的气质特征或倾向,尤其是气质反应性和自我控制,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如何应对社会变迁和如何在新的环境中成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鼓励父母用源自关爱的高控教养方式来帮助孩子学习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并取得成就。随着社会化目标的变化,具有更多情感和指导成分的关爱性高控教养方式会更有效地促进儿童青少年社会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发展,并对在社会变迁中易受伤害的个体(如害羞儿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减轻他们在社会和心理适应上的困难。

3.1 中国儿童早期气质特征

尽管在任何群体内都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中国儿童在婴幼儿期在很多方面还是表现出独特的气质特征或倾向。例如,与西方儿童相比,中国儿童在社会情境中更少主动和别人交往,情绪表达水平较低(Camras et al., 1998; Wang, 2022)。Chen 和 French (2008) 认为,中国和西方儿童在行为和情绪上的差异可以通过 Rothbart 模型中的气质反应性

(temperamental reactivity)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两个主要维度来系统表征。

气质反应性指儿童对具有挑战性的、有压力的情境的反应程度,包括这些情境引起的生理唤醒、趋近或回避行为以及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反应(Rothbart, 2011)。在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的一种特定的气质反应是行为抑制(behavioral inhibition),即儿童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反应(Kagan, 1998)。与西方儿童相比,中国儿童的行为抑制水平更高,对陌生情境的反应更强。Chen 等(1998)发现,中国幼儿在陌生实验室环境中比加拿大幼儿更加警觉、胆小和害怕。具体来说,和加拿大儿童相比,中国儿童更少主动离开母亲去探索环境(包括放在房间中间的各种很有吸引力的玩具),更多地与母亲保持身体上的接触(如坐在母亲腿上或靠在母亲身上)或保持比较近的距离。此外,中国幼儿在与陌生人的互动中更加紧张,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恐惧行为,不愿意接近陌生人。

中国儿童和西方儿童的反应性与自主神经和神经内分泌过程有相似的关联(如 Ip et al., 2021; Xu et al., 2009)。Xu 等(2009)发现,中国儿童对压力情境的反应与心跳周期(心跳之间的间隔或一个心动周期的时间)呈负相关;高反应性儿童对陌生刺激特别敏感,表现出较短的心跳周期或较快的心率。这些结果与西方文献一致,表明中、西方儿童的反应性在生理和行为层次上应该没有区别。Doan 及其同事(2017)发现中国儿童在压力环境中的皮质醇水平高于美国儿童,这与行为观察研究的结果一致(Chen et al., 1998)。

自我控制主要指根据情境需要来启动、维持、调整、延迟或约束特定行为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高水平的自我控制可以预测未来的学习成绩和合作行为,而缺乏自我控制可导致学习困难、行为问题和同伴关系问题(Eisenberg et al., 2006)。也有研究表明,过度自我控制会导致心理问题,特别是内隐性心理问题(Volbrecht & Goldsmith, 2010)。相对于西方儿童,中国儿童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控制(如 Chen et al., 2003; Ding et al., 2021; Sabbagh et al., 2006; Schirmbeck et al., 2020)。Chen 等(2003)在一项观察研究中,让中国和加拿大幼儿在自由活动后把玩具放在筐里。结果发现,中国幼儿在没有成人干预的情况下比加拿大幼儿更好地完成任务(内化的自我控制),而加拿大幼儿表现出更多的反抗行为(指不仅不收拾玩具,更是在母亲要求或帮

他/她收拾玩具时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此外, 在一项简化的“延迟任务”活动中, 实验员让儿童坐在小桌子旁边, 向儿童展示如何用各种颜色的蜡笔在纸上画图, 然后告诉他/她自己有事要出去一下, 不要碰蜡笔, 等实验员回来时他/她才可以画。结果发现, 与加拿大幼儿相比, 中国幼儿在延迟任务上等待的时间更长。Chen 等(2003)的研究结果也被后来其它研究所证实。如研究者向中国和美国的学龄前儿童展示一张纸, 上面覆盖着随机排列的狗、球和杯子的图像, 要求他们在 3 分钟内将球后圈出尽可能多的球-狗(狗在球后)配对, 中国儿童比美国儿童完成得更好(Lan et al., 2011; Schirmbeck et al., 2020)。

需要指出的是, 儿童早期气质特征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在中国和西方可能不同。在西方文献中, 幼儿期的行为抑制通常预测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社会行为和心理适应问题, 如同伴拒绝、学习困难、社会性焦虑、抑郁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等(Fox et al., 2005)。但是, 在中国的纵向研究表明, 早年的气质反应性对个体发展有积极意义, 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健康等正面指标相关(Chen et al., 2009; Chen, Fu et al., 2021)。高抑制的儿童可能容易受到心理困扰, 出现内隐性心理问题(如 Fox et al., 2005)。然而, 在中国, 童年和青少年期的同伴关系对抑制儿童的心理问题的发展可以起缓冲作用。行为抑制儿童与他人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及获得的社会支持似乎能够减少或保护他们免于产生内隐性问题。自我控制的后期发展结果在中国和西方也可能不同。一般来说, 自我控制有助于完成认知任务和在情境中表现适当的行为, 但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化目标可能会影响自我控制的具体发展结果。根据 Cheung 和 Park (2010)的观点, 适当的自我控制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主要起到自我保护作用, 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主要是让个体更好地参与亲社会和合作活动。因此, 在西方社会中, 自我控制主要用于促进独立自主行为的发展; 而在中国, 自我控制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它如何促进有利于群体利益的社会行为的发展。

3.2 传统文化与社会化目标和方式

作为世界上文明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中国几千年来经历了多次迁徙、融合和发展, 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 对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和个体发展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传统儒家文

化植根于农耕生活, 高度重视规则的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 强调家庭、家族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自上个世纪初以来, 儒家和其他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有所减弱, 但文化体系的核心如群体取向, 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观念和社会化过程(Chen, 2023)。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 但成员在群体内的地位不尽相同, 为了集体福祉应该服从权威甚至牺牲个人利益(Oyserman et al., 2002)。在家庭中, 群体取向表现为家庭成员在家长制等级结构的基础上相互依赖, 以实现提高家庭生活条件、地位和声誉的共同目标(Chao, 1995)。

研究表明, 与西方父母相比, 中国父母更关注孩子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则, 以及在学习和其他方面是否取得成就(Chen et al., 2019)。中国父母往往高度参与孩子的学习和社会活动。而且, 为了让孩子听话、顺从, 父母的参与常常表现为高度的行为控制(如监督和限制孩子的活动)和心理控制(如和别的孩子相比, 让孩子感到不足和羞愧) (Chao & Aque, 2009)。Jose 等(2000)和 Kho 等(2019)发现, 当孩子表现不好时, 中国父母比美国父母更可能使用惩罚策略, 如限制孩子的活动。Ng 等(2007)在观察学习环境中的亲子互动时也发现, 与美国父母相比, 中国父母更专注于孩子的错误, 告诉孩子在完成任务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强调严重后果, 很少表扬孩子。中国父母更多地使用批评、责备、惩罚等严厉的教育方式。自蔡美儿 2011 出版了《虎妈战歌》后, 这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在公众中又被称作“虎妈”方式。中国父母心理控制的形式主要是让孩子感到羞愧和内疚(如告诉孩子“爸爸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 “其他孩子都能做好, 为什么你不行?” “不知道为爸爸妈妈争口气”; Chao & Aque, 2009; Fung, 2006)。Fung 和 Lau (2012)认为, 中国父母试图通过使用羞辱和内疚诱导来促进孩子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的了解, 帮助他们学习社会责任和自我控制。西方父母往往担心使用这些教养策略会对孩子自主性的发展产生有害影响, 但中国父母很少有这种顾虑。

中国父母比西方父母更常用的这种严厉的教育方式似乎符合 Baumrind (1971)的专断型(authoritarian)方式。专断型教养方式重点是严格控制和要求孩子服从。但是 Baumrind 理论中的专断型教养方式不仅意味着父母的高度控制, 还伴有消极情绪, 甚至拒绝和敌意。因此, 使用这一方式往

往会导致儿童的不良发展和适应问题(如 Chen et al., 1997; Dornbusch et al., 1987; Shen et al., 2018)。如果中国父母使用相对较强的“专断型”教养方式,那么作为这种教养方式的结果,中国儿童会比西方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和学业问题。这显然与研究结果不符(如 Chen & Tse, 2008; Mullis et al., 2008)。为了解决这所谓的“悖论”,Chao (1994)认为,中国父母所表现出的教养方式不应被视为专断,因为他们在儿童教养中使用的高压或强制方式与关心和爱护有关,而不是冷漠或敌意。Chao (1994)用“guan(管)”来描述中国父母教养中训练、控制、体罚、帮助、关怀等多种成分的混合体。但后来关于 guan 的研究经常得出不一致或令人困惑的结果(如 Chen-Bouck et al., 2019; Gao et al., 2015; Stewart et al., 2002),这可能与 guan 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测量时难以界定有关。

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中社会化的特点,基于 Chao 等人的工作,Chen (2023)强调中国父母使用的教养方式两个有内在联系的重要方面——关爱和高控,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关爱性高控方式(care-based power-assertive parenting, CBPAP)。关爱性高控方式可以定义为父母以高控行为表达关爱或父母在关爱基础上谨慎地使用高控策略。这种教养方式的目标是帮助儿童青少年学习具有社会价值的行为,并在群体取向的社会中取得成就。它既不同于专断型教养方式,也不同于权威型教养方式(authoritative parenting)。基于父母温暖(parental warmth)和民主型控制相结合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主要是西方社会中用以促进儿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展(Maccoby & Martin, 1983)。西方文献中的父母温暖主要指父母对孩子直接表达积极的情绪(如亲吻孩子,对孩子微笑,说“我爱你”,当孩子感到不安时给与安慰),以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相对于西方父母,中国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往往表现出较低程度的温暖和情感表达(Camras et al., 2008; Huntsinger & Jose, 2009)。而作为 CBPAP 的一个关键要素,中国父母的关爱通常表现为对孩子的指导和工具性支持(例如,“帮助和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学会礼貌”; Cheah et al., 2015)。中国父母也倾向于通过尽可能地付出和牺牲来表达他们的关爱。与关爱紧密相连的是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并因担心孩子达不到期望而产生焦虑,由此导致使用高控高压的严厉教养行为。

在中国社会,一般认为父母的高控行为是必要

的,是父母管教孩子负责任的表现,而没有对孩子施加足够控制的父母往往被认为不负责任(Chao, 1995; Chen et al., 2019)。这和西方社会基于个人自由和自主的文化价值观鼓励父母尽量不使用高控方式不同(Maccoby & Martin, 1983)。然而,中国文化所鼓励的高控行为应源自父母的关爱,旨在帮助孩子学习良好的行为,促进儿童能力的发展,而不应像专断型教养方式(Baumrind, 1971)那样由父母的愤怒、敌意、冷漠或忽视所引起,对儿童发展有消极作用。中国儿童青少年倾向于从正面来理解父母高控策略的使用,对父母关爱的理解影响到他们对父母高控行为的看法和反应(例如,“父母这样做是为我好”; Cheah et al., 2019),这可能使得他们受益于 CBPAP 的指导功能,同时减少其潜在的不良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当父母强调行为准则(如合作和服从)并采取高控行为时,往往和儿童的个人欲望相抵触,这可能不太容易被大多数儿童理解,尤其在年幼的时候。当儿童不理解时,基于关爱而非温暖的高控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儿童产生焦虑、挫折感和其他负面情绪,这也许是中国儿童的内隐性心理问题相对较多的一个原因(如 Zhong et al., 2013)。

4 社会变迁对父母教养方式和个体行为与心理特征的展现水平和功能性意义的影响

多元建构观点认为,社会变迁会影响群体水平上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而这些影响体现在家庭、学校等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改变社会化过程(如父母教养方式),社会变迁最终对个体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展现水平和功能性意义产生影响。

中国社会变迁对父母的儿童教养方式的影响已经有一些证据。例如,Chen 和 Chen (2010)比较了上海地区 1998 年和 2002 年小学生父母的儿童教养态度。父母的自我报告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温暖(warmth) (如“当我的孩子感到不安或害怕时,我给他/她安慰和理解”),鼓励自主和独立(如“我鼓励我的孩子要有独立性,不要依赖我”),和强制性高控(如“我不允许我的孩子对我的决定有任何意见”)。结果显示,2002 年的父母在温暖和鼓励自主和独立方面的得分高于 1998 年的父母,而在强制性高控方面的得分低于 1998 年的父母。1998 年到 2002 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教养方式的变化可能早就发生了,但两组的差异说明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对父

母教养态度有着显著影响。随着社会的变化,中国的父母更多地鼓励儿童独立性和探索性行为,而更少使用强硬的教养方式。同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亲子情感交流在提高儿童能力方面的作用,对儿童的心理需求也变得更加敏感。在一项母亲和学步儿童互动的实验室观察研究中,Chen和Chen等(2021)比较了1995年和2008年中国城市母亲鼓励引导儿童自主(*autonomy-oriented*)行为和联结(*connectedness-oriented*)行为。母亲对自主行为的鼓励主要指督促孩子进行探索和独立的活动(如“看,那里有这么多玩具给你玩,你为什么不去玩呢?”)。母亲对联接行为的鼓励包括督促儿童和自己一起活动,和自己保持近距离活动,以及与他人交流(如“把小卡车开过来,在妈妈旁边玩”)。与1995年的母亲相比,2008年的母亲总体上明显地减少了对儿童的活动的介入和干预,而且在控制整体参与水平后,2008年的母亲比1995年的母亲更多地鼓励儿童探索环境和独立活动。

同父母教养方式变化相对应的是,儿童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Chen和Chen等(2021)比较了1995年和2008年中国城市儿童的自主行为和联结行为。在10分钟的自由活动里,2008年的儿童比1995年的儿童独立探索行为时间更长,而发起的联结行为更少。社会变迁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似乎也产生了影响。Chen等(2014)比较了上海地区1992、1998和2002年小学3到5年级学生的孤独感,发现2002年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比1992年和1998年更低。这一研究也选取了2005年北京儿童和2007年河北农村儿童作比较,结果显示,2005年北京儿童的孤独感水平和2002年上海儿童相似,而2007年农村儿童的孤独感水平和1992年和1998年的上海儿童相似。这期间中国儿童的抑郁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孤独感基本相同。新的价值观鼓励个人独立性和自信,有利于提高应对负面情绪和其他心理问题的能力。因此,当代城市儿童青少年可能会对社会的和心理困扰变得更有韧性。这一解释也符合侯娟等(2024)和张明杨等(2024)关于近年来成人的婚姻满意度和积极理想情绪有所上升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变迁对个体行为与心理特征的展现水平有了一定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的研究更集中于考察中国和西方儿童青少年的行为与心理特征的功能性意义。功能性意义不仅指人们对特定行为的主观看法,更主要的是指这种行为在社会情境中和在个体发展中起

到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

Chen等(2005)的一项对中国害羞儿童在不同时期的适应情况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变迁对行为的意义的作用。害羞指在社会情境中或觉得会被别人评价时表现出焦虑、恐惧和退缩的行为。作为在早期气质反应性和行为抑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行为,害羞反映低水平的社会主动性和中等水平的自我控制(Chen, 2018)。在高度竞争性的现代都市环境中由于社会主动性的价值上升,害羞行为往往被认为代表缺乏自信和缺乏社会能力(Chen & French, 2008)。因此,害羞儿童和青少年随着社会变迁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和心理问题。这一研究样本包括1990、1998和2002年三组上海小学儿童,害羞行为通过同伴提名方法加以测量(如“某个人很害羞”)。结果发现,在1990年,害羞和良好的适应,如在学校里的社会地位(当干部,获奖)、同伴接受、教师评定的学校能力和学习成绩正相关,而和学校适应的问题、孤独感和抑郁感负相关。总之,害羞儿童那时候能够得到成人与同伴的理解、接受和支持(Chen et al., 2006),各方面表现和适应都比较好(比其他儿童更好)。但是,在2002年,害羞和适应指标的关系完全相反——和社会能力、同伴中的地位、学习成绩等负相关,而和同伴拒绝、学习问题、心理问题等正相关。在新的环境中,害羞儿童在人际交往方面和学习上比其他儿童有更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害羞儿童意识到和体验到这些困难,产生了抑郁感和其它心理问题。Chen等(2005)研究中有关1998年儿童的结果大多不显著。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害羞和同伴接受与同伴拒绝都呈正相关,显示在1998年同伴对待害羞儿童的矛盾态度,即同时喜欢和不喜欢或者有人喜欢而有人不喜欢。1998的结果可能体现了社会变迁的中转阶段。当然,宏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反映到儿童青少年的社会交往、态度、行为和心理适应上有一些延迟,但Chen等(2005)的研究表明上世纪末是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被此后的研究所证实(如Liu et al., 2015)。中国农村的变化要晚一些。Chen等(2011)在2007年河北农村的研究发现,儿童害羞与同伴关系、学校适应和心理健康指标的关系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在1990年代早期结果几乎完全相同。

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如何表现

在害羞行为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儿童青少年的其他行为和态度方面的研究(Liu et al., 2018)揭示, 自我价值观在城市儿童的适应中起更显著的积极作用, 和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而和情绪问题呈负相关; 相对而言, 群体价值观在农村儿童的适应中起更显著的积极作用, 和学校能力和幸福感的关系更强。Chen, Fu 等(2018)发现, 社会敏感性(如“我很重视别的孩子是怎么说我的”)与学校能力和心理适应的关系在城、乡儿童中也不同。在农村儿童中, 社会敏感性和社会能力、同伴接受及学习成绩呈正相关, 而和孤独感和抑郁感呈负相关; 在城市儿童中, 社会敏感性和孤独感和抑郁感呈正相关, 和社会能力和学习成绩无显著相关。社会敏感性涉及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别人怎么看我)的关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比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重要,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必须加以重视。但社会敏感性和当代都市社会要求和鼓励的独立性、自我表现、自信心等价值观可能有矛盾。此外, Chen 等(2024)发现, 对面子的关注(concern for mianzi)在中国城、乡青少年中也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意义。面子指人们在社会网络中的威望和地位(或从广义上讲在他人面前的形象)的社会认可(翟学伟, 2005), 而对面子的关注指个体对面子的意识、重视和渴望拥有的程度。研究结果显示, 面子关注在农村青少年中与社交能力和学校适应指标正相关, 在社会交往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 在城市青少年中, 面子关注和行为和心理适应等各种问题正相关。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这些结果对未来的心理学研究可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张明杨等(2024)对 1980 年到 2020 年中国人理想情绪的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变迁对积极情绪的意义的影响。文化和情绪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的一个经典问题。传统中国文化, 包括儒家和道家, 都鼓励人们控制甚至抑制自己的情绪, 尤其是高唤醒情绪。在社会交往中倾向于表现这类情绪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没有修养、不成熟的(Bond & Hwang, 1986)。而在西方社会, 一般认为, 情绪表达代表著对自己的个人价值、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追求, 有利于身心健康。张明杨等(2024)发现,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积极情绪的偏好水平更高。

前面提到, 多元建构观点认为, 在中国的社会

变迁过程中, 新的文化价值观如竞争性和独立性会影响社会交往和个体行为, 但传统价值观如自我控制和服从集体不一定会消失或减弱(Chen, 2015; 蔡华俭 等, 2020)。这方面的证据不多, 可能和中国目前的社会变迁还处初级阶段有关。尽管如此, 有关行为与心理特征的意义的研究开始逐渐揭示这一趋势。例如, Zhang 和 Xu (2019)测量了中国和美国儿童对害羞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 发现美国儿童对害羞的实体论看法(“有些孩子很害羞, 即使他们长大了也会一直这样”)更强, 而中国儿童对害羞的动态论看法(“孩子的害羞不是固定的, 而是随时间而改变”)更强。此外, 研究者还让孩子们提名他们认为害羞的同学, 然后回答三个问题: “你经常和.....一起玩吗?” “你认为.....是你的朋友吗?” 以及“你喜欢.....吗?”。中国儿童比美国儿童更喜欢害羞的同学, 也更愿意成为害羞同学的玩伴或朋友。中介分析表明, 内隐理论和儿童与害羞同学的关系有关。Zhang 和 Xu (2019)的数据是在 2014 年在上海和夏威夷收集的, 中西方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差异。传统文化在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深层次的印迹可能不会被社会变迁轻易抹去(傅根跃, 李康, 2024)。王祥坤等(2024)的研究揭示, 从 2008 至 2020 年, 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和法制化水平的上升, 中国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反映了社会道德水平增长。作者认为, 这一趋势是由于社会的个体化和个体的理性和自主责任意识提高了, 进而抑制了道德推脱倾向。社会责任价值观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大学生的责任心的上升或道德推脱水平下降也可能反映了传统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持续影响。张明杨等(2024)的研究发现, 中国大学生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都可以正向预测对积极情绪的偏好,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社会变迁可能导致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的共存和融合, 从而形成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多元文化环境。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韩国母亲的教养方式和小學生的社会、学校和心理适应的关系(Ju et al., 2021)。韩国传统上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 高度重视家庭忠诚和孝道(Kim, 2006)。韩国近代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到城市的移民, 导致了快速的社会变革。在这一时期, 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于韩国社会并影响个人的行为, 比如尽管学校鼓励学生独立、自主等行为, 儒家伦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结

果表明,母亲鼓励自主和儿童的社会能力、同伴接受和学习成绩正相关,而和社会性焦虑和抑郁负相关。更有意思的是,父母强制性高控教养方式和同伴接受、学习成绩等也呈正相关。这一结果和西方文献截然不同,说明在韩国父母鼓励儿童自主和高控并不矛盾,两者对儿童的社会能力和学校能力都有正面作用。中国的社会变迁不可能和韩国完全一样,但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儿童青少年在社会变迁情境中的发展也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更主要的是,这些结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前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会变迁对人的行为 and 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线性”的过程,而更可能符合多元建构的理论框架。

5 小结和建议

《心理学报》在2019年“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专栏征稿启事中写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众国家、民族迷茫应给自己的后代传授或培养什么技能,方可让我们的孩子在20年后仍有竞争力,让下一代能安身立命。”的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发生激烈变化,心理学家应该关注这一现实,研究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并尽可能提出有助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应对社会变迁的有效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变迁所带来的机会而减少变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本文讨论了中国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和相关的研究,以下是几条概要总结。

(1)根据多元建构观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和整合,构成了人的发展的新的环境。不同价值观,包括与市场化相匹配的价值观(如竞争性、独立性、自我表现)和传统价值观(如社会关系,服从集体,社会责任、自我控制),之所以能够共存是因为他们在人的适应和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整合可能促进在原有气质特征的基础上产生新的行为品质,有助于个体在不同环境中灵活地应对各种挑战。如图1的情境-发展观模型所示,处于中心位置的社会互动是群体和个体水平上的多元建构的关键,也是社会变迁和文化整合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机制,而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情绪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

(2)讨论中国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需要了解

中国人的气质特征和传统社会化方式,他们既是社会变迁影响或多元建构的基点,也是社会变迁影响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儿童在生命早期表现出独特的气质特征或倾向,其中有一些,如气质反应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行为抑制和害羞行为,可能更适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稳定的环境,而与新的商品化的竞争性都市环境不甚符合。也有一些行为特征,如自我控制和与之有关的行为,如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甚至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的遵守规则 and 责任感,有助于人们在各种情境中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自我控制的品质可能不仅是下一代在纷乱的世界里(如世界冲突与战争,大规模疫情爆发)安身立命的“本钱”,也可能是他们进一步发展高水平社会情绪能力和心理适应的重要基础。在宏观层面上,心理学和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士,应该考虑如何逐步创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允许和促进不同气质特征的儿童健康发展,同时通过有效的教育和干预手段有针对性地帮助具有特定气质特征的儿童扬长避短,提高他们的适应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孝道文化,对儿童社会化有一定的要求,对家庭关系和父母应该如何教养孩子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相比西方父母,中国父母和孩子平等交流和情绪表达偏少,更多地采用批评、管教、控制、惩罚等严厉的教养方式,这种方式在心理学文献中常常被认为是专断型方式,对儿童发展有着负面影响。但是,中国文化所鼓励的父母的高度介入和严厉的教养方式应源自于父母的关爱,旨在帮助孩子学习社会规范和良好的行为。随着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化目标的变化和父母教育水平及相应的儿童教养水平的提高,亲子交往中的温暖情绪会增加,父母也会更多地采取指导性和支持性,而不是强制性策略来进行督促和控制,促使儿童对父母行为的理解和积极的反应。由于和群体文化取向和家庭关系的等级结构及相应的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有关,中国父母的儿童教养方式在“关爱”和“高控”的本质特征上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具有更多感情和指导成分的关爱性高控教养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地促进儿童学习具有社会价值的行为,取得成就,并且更加适合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

(3)与社会变迁有关的研究来自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具有不同研究目的的项目,还不能形成一套清晰连贯的体系。现有的结果表明,从上世纪90

年代初开始,中国城市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的行为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儿童青少年独立性和社会主动性的重视和相应的教养行为的变化,以及儿童青少年独立性和社会主动性的行为表现得越来越多。农村父母和儿童的行为变化相对来说慢一些。社会变迁不仅影响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展现水平,而且影响它们在社会交往情境中和个体发展中的功能性意义。比如,几十年来,中国人对积极情绪,包括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在上升。对社会主动性、独立性、自信心和自我表现的积极评价和重视导致害羞行为在社会交往中的价值下降,甚至成为问题行为。尽管如此,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中国儿童认为害羞行为并非一成不变,不像西方儿童的看法那样更加僵硬(Zhang & Xu, 2019),因而仍然愿意帮助害羞同伴,和他们交朋友。而且,父母教养方式中情感支持的增强似乎也会起一定的保护性作用,可以缓冲害羞儿童在社会和心理适应上的困难(Bullock et al., 2022)。和害羞行为不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自我控制及有关行为在儿童青少年的适应中的意义在这期间发生了变化。社会变迁对社会化和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4)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中国社会变迁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更感兴趣,研究范围也更加多样化。本期论文就涉及不同的课题,如城乡高中生的教育效用与教育志向,积极理想情绪,婚姻满意度,道德认知,工作价值观,老年人心理健康等。研究设计和分析也更加合理、有效,从而提供了更有意义的结果。例如,包寒吴霜等人(2024)的研究使用了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父母给孩子取名的变化趋势,侯娟等(2024)和王祥坤等(2024)的研究分析了社会指标(市场化指数、城镇人口比、离婚率、少儿抚养比或家庭压力等)对婚姻满意度或道德推脱的预测程度。尽管这些研究不一定明确或准确地揭示宏观水平上各种因素的因果联系,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会变迁对个体影响的过程。

本文最后提出一些有关研究方向的建议。

(1)对中国儿童和成人的研究,包括本期专刊很多论文中报告的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理论(如 Elder 生命历程理论, Greenfield 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和方法(如 Bandura 等道德推脱量表, Cable & Edwards (2004) 工作价值观量表)。采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原因和优势,这些理论和方法至少已经在国外得到

某种程度的验证,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地开展研究,结果也可以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比较。然而,我们应该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因为它们是根据西方社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建立起来的。本文也提出,西方的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理论,特别是在描述非西方社会的变迁趋势时,总体上是一种“西方化”观点,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定时期内和一些方面产生的新现象和问题,但这种单向“线性”的模式对于中国和其它很多国家的变迁可能过于简单甚至很不符合,用它们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研究也许并不合适。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尽可能的不被现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所限制甚至“套牢”。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迁的背景,给当代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开展独创性研究的难得的机会。尽管这需要大量的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创造性工作,但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2)本文阐述了多元建构观点的一些基本框架和主要论点,但关于群体和个体的建构过程有很多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比如,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融合和整合,从而促进新的行为品质和能力的发展,需要在理论上和研究中逐步探索。此外,尽管这一观点可能为研究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提供一条可选择的思路,甚至有助于形成具体的研究假说,但目前关于社会变迁中多元价值观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包括本期大部分论文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化,尤其是个人主义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结果似乎更多地支持 Greenfield 的理论(2009)。应该指出,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的文化及其对行为和心理的影响是多元建构观点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应该关注这些文化被如何容纳和整合到中国社会情境中并和传统文化一起构成社会交往和人的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

(3)可能受现有理论和方法的限制,关于中国社会变迁和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西方心理学家感兴趣的课题上,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主观幸福感、孤独感、工作价值观等。这些课题很多反映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心理学对个体“自我”概念(the “self”)的关注。甚至连集体主义也更多地从个人主义角度来诠释和研究,这在心理学中尤为突出(如用自我报告测量“集体主义”个体人格特征或自我知觉)。我们在研究这些课题的同时,也应该思考如何跳出“自我”框架,有针对

性地考察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有紧密关系的独特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变化(如家庭关系, 社会关系, 创造能力, 家庭经济地位的升降和地区城市化发展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哪些部分可能对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发展和适应有正面促进作用或保护作用等)。张良和张文新(2024)对高等教育改革、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改革、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城乡学生的教育观念和态度的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研究这些问题对学科的发展和应用应该有更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4)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基本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有些研究已经开始涉及到应用社会指标来考察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如: 包寒吴霜 等, 2024; 侯娟 等, 2024; 王祥坤 等, 2024), 大部分研究仍然集中在变迁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的比较表面的描述性分析。而且, 目前的研究主要观测变量(如时间、特定社会指标、行为)之间的静态关系, 几乎没有考虑个体和群体水平上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变迁中其他动态建构过程。探索宏观层面的变迁如何导致人的心理和行为变化的机制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变迁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很重要, 应该加以重视。这类研究涉及多个层面的因素, 可能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采用多种方法(如追踪研究, 质性研究, 民族志研究)来逐步探索。

(5)中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大国, 各民族都具有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特征, 不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目前关于社会变迁和心理特征的研究大多在发达地区汉族群体中进行, 结果不一定和其他地区完全符合。因此, 今后的一个方向是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 and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变迁在不同情境中对人的发展的意义。除了地区和民族之外, 其他个人和群体因素, 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 个性倾向, 社区或村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 当地政策等, 可能会调节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反应。研究这些调节因素可帮助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人设计更有效的方案和措施来提高他们应对社会变迁的能力。

(6)社会变迁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Chen, 2015)。人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变迁影响的被动的接收者, 而是可以起着积极主动积极的作用。因此, 正如 Elder 的生命历程理论中的人的能动性原则所指出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

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结果。但在社会变迁的环境中, 人们具体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并构建自己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楚, 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Bao, H.-W.-S., Cai, H. J., & Jing, Y. M. (2024).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unique names: The emphasis on uniqueness matter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954–963.
- [包寒吴霜, 蔡华俭, 敬一鸣. (2024). 名字独特性上升的成因: 宏观和微观解释. *心理学报*, 56(7), 954–963.]
-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 Pt.2), 1–103. doi: 10.1037/h0030372
- Blakemore, S. J., & Mills, K. L. (2014). Is adolescence a sensitive period for sociocultural process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187–207. doi: 10.1146/annurev-psych-010213-115202
- Bond, M., & Hwang, K. (198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M. Bond (Ed.), *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ople* (pp. 213–26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nfenbrenner, U., & Morris, P. A. (2006). The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R. M. Lerner & W. Dam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pp. 793–828). John Wiley & Sons Inc.
- Bullock, A., Xiao, B., Liu, J., Coplan, R., & Chen, X. (2022). Shynes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eer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middle school transi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1(1), 86–98. doi: 10.1007/s10826-021-01979-3
- Cable, D. M., & Edwards, J. R. (2004). Complementary and Supplementary Fit: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9(5), 822–834.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9.5.822>
- Cai, H., Huang, Z., Lin, L., Zhang, M., Wang, X., Zhu, H., ... Jing, Y. (2020).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 literature review.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0), 1599–1618.
-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谢怡萍, 杨盈, 杨紫嫣, 敬一鸣. (2020).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8(10), 1599–1688.]
- Camras, L., Kolmodin, K., & Chen, Y. (2008). Mothers' self-reported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Mainland Chinese, Chinese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2(5), 459–463. doi:10.1177/0165025408093665
- Camras, L. A., Oster, H., Campos, J., Campos, R., Ujiie, T., Miyake, K., Wang, L., & Meng, Z. (1998). Production of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in European American, Japanese, and Chinese infa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4), 616–628. doi:10.1037/0012-1649.34.4.616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doi:10.2307/1131308
- Chao, R. K. (1995).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 cultural models of the self reflected in mothers' childrearing beliefs. *Ethos*, 23(3), 328–354. doi: 10.1525/eth.1995.23.3.02a00030
- Chao, R. K., & Aque, C. (2009). Interpretations of parental control by Asian immigrant and European American youth.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3), 342–354. doi: 10.

- 1037/a0015828.
- Cheah, C. S. L., Li, J., Zhou, N., Yamamoto, Y., & Leung, C. Y. (2015). Understanding Chinese immigrant and European American mothers' expressions of warmt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12), 1802–1811. doi: 10.1037/a0039855
- Cheah, C. S. L., Yu, J., Liu, J., & Coplan, R. J. (2019). Children's cognitive appraisal moderates associa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ly controlling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6, 109–119. doi: 10.1016/j.adolescence.2019.08.005
- Chen, X. (2012).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 Introductio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4), 321–325. doi: 10.1111/j.1750-8606.2012.00259.x
- Chen, X. (2015).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hange for hum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1), 56–59. doi: 10.1002/ijop.12128
- Chen, X. (2018). Culture, temperament, an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Review*, 50, 42–53. doi: 10.1016/j.dr.2018.03.004
- Chen, X. (2023). *Socialization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9781009072380
- Chen, X., Bian, Y., Xin, T., Wang, L., & Silbereisen, R. K. (2010). Perceived social change and childrearing attitudes in China. *European Psychologist*, 15(4), 260–270. doi: 10.1027/1016-9040/a000060
- Chen, X., Cen, G., Li, D., & He, Y. (2005).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The imprint of historical time. *Child Development*, 76(1), 182–195. doi: 10.1111/j.1467-8624.2005.00838.x
- Chen, X., & Chen, H. (2010).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n R. K. Silbereisen and X. Chen (Eds.),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results* (pp. 209–226). London, England: Sage
- Chen, X., Chen, H., Li, D., & Wang, L. (2009). Early childhood behavioral inhibition and social and school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A 5-year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80(6), 1692–1704. doi: 10.1111/j.1467-8624.2009.01362.x
- Chen, X., Chen, X., Zhao, S., Way, N., Yoshikawa, H., Zhang, G., Deng, H., Cao, R., Chen, H., & Li, D. (2021). Autonomy- and connectedness-oriented behaviors of toddlers and mother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in urban China.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7(8), 1254–1260. doi: 10.1037/dev0001224
- Chen, X., DeSouza, A. T., Chen, H., & Wang, L. (2006). Reticent behavior and experiences in peer interactions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4), 656–665. doi: 10.1037/0012-1649.42.4.656
- Chen, X., Dong, Q., & Zhou, H. (1997). Authoritative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social 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1(4), 855–873. doi: 10.1080/016502597384703
- Chen, X., & French, D. C. (2008).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591–616. doi: 10.1146/annurev.psych.59.103006.093606
- Chen, X., Fu, R., Li, D., Chen, H., Wang, Z., Wang, L. (2021).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early childhood and adjustment in late adolescence in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92(3), 994–1010. doi: 10.1111/cdev.13463
- Chen, X., Fu, R., Liu, J., Wang, L., Zarbatany, L., & Ellis, W. (2018). Social sensitivity and social, schoo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children across contex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6), 1124–1134. doi: 10.1037/dev0000496
- Chen, X., Fu, R., & Yiu, W. Y. V. (2019). Culture and parenting.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Biology and ecology of parenting* (pp. 448–473).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doi: 10.4324/9780429401459-14
- Chen, X., Hastings, P. D., Rubin, K. H., Chen, H., Cen, G., & Stewart, S. L. (1998). Child-rear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toddlers: A cross-cultural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4), 677–686. doi: 10.1037/0012-1649.34.4.677
- Chen, X., Li, D., Liu, J., Chen, H., & Zhao, S. (2018). Judgments of damage to public versus private property in Chinese children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21(1), e12506. doi: 10.1111/desc.12506
- Chen, X., Rubin, K. H., Liu, M., Chen, H., Wang, L., Li, D., Gao, X., Cen, G., Gu, H., & Li, B. (2003). Compliance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toddlers: A cross-cultur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7(5), 428–436. doi: 10.1080/01650250344000046
- Chen, X., & Schmidt, L. A. (2015).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In M. E. Lamb & R. M. Lern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cience: Socioemotional processes* (pp. 152–200). John Wiley & Sons, Inc. doi: 10.1002/9781118963418.childpsy305
- Chen, X. & Tse, H. C. (2008).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Canadian-born children with Chinese and European background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4), 1184–1189. doi: 10.1037/0012-1649.44.4.1184
- Chen, X., Wang, L., & Cao, R. (2011). Shyness-sensitivity and unsociability in rural Chinese children: Relations with social, schoo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82(5), 1531–1543. doi: 10.1111/j.1467-8624.2011.01616.x
- Chen, X., Wang, L., Li, D., & Liu, J. (2014). Loneli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across contex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10), 2324–2333. doi: 10.1037/a0037689
- Chen, X., Zhou, J., Li, D., Liu, J., Zhang, M., Zheng, S., & Han, X. (2024). Concern for mianzi: Relations with adjustment in rural and urban Chinese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95(1), 114–127. <https://doi.org/10.1111/cdev.13964>
- Chen-Bouck, L., Patterson, M. M., & Chen, J. (2019). Relations of collectivism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training beliefs to Chinese parenting.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50(3), 396–418. doi: 10.1177/0022022118822046
- Cheung, R. Y. M., & Park, I. J. K. (2010). Anger suppression,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depression among Asi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16(4), 517–525. doi: 10.1037/a0020655
- Choudhury, S. (2010). Culturing the adolescent brain: What can neuroscience learn from anthropology?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5(2-3), 159–167. doi: 10.1093/scan/nsp030
- Ding, N., Frohnwieser, A., Miller, R., & Clayton, N. S. (2021). Waiting for the better reward: Comparison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in young children across two cultures. *PLoS ONE*, 16(9), e0256966. doi: 10.1371/journal.pone.0256966
- Doan, S. N., Tardif, T., Miller, A., Olson, S., Kessler, D., Felt, B., & Wang, L. (2017). Consequences of 'tiger' parenting: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ren's cortisol stress response. *Developmental Science*,

- 20(3). doi: 10.1111/desc.12404.
- Dornbusch, S. M., Ritter, P. L., Leiderman, P. H., Roberts, D. F., & Fraleigh, M. J. (1987). The relation of parenting style to adolescent school performance. *Child Development*, 58(5), 1244–1257. doi: 10.2307/1130618
- Eisenberg, N., Zhou, Q., Liew, J., Champion, C., & Pidada, S. U. (2006). Emotion, emotion-related regul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ing. In X. Chen, D. C. French, & B. H. Schneider (Eds.), *Peer relationships in cultural context* (pp. 170–197).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der, G. H., Jr.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der, G. H., Jr. (1998).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69(1), 1–12. doi: 10.2307/1132065
- Fang, W. (2008). A psychology of transformation: The membership approac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137–147.
- [方文. (2008). 转型心理学: 以群体资格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 (4), 137–147.]
- Fox, N. A., Henderson, H. A., Marshall, P. J., Nichols, K. E., & Ghera, M. M. (2005). Behavioral inhibition: Linking biology and behavior within a developmental framework.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6, 235–262. doi: 10.1146/annurev.psych.55.090902.141532.
- Fu, G. Y., & Lee, K. (2024).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tability in a rapid changing society: An illustration of modesty effec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994–998.
- [傅根跃, 李康. (2024). 社会变迁中心理与行为的稳定性: 以谦虚效应为例. *心理学报*, 56(7), 994–998.]
- Fung, H. (2006). Affect and early moral socialization: Some insights and contributions from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In K. Uichol, K. S. Yang, & K. K. Hwang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 175–196). New York, NY: Springer.
- Fung, J., & Lau, A. S. (2012). Tough love or hostile domination?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relational induction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6), 966–975. doi: 10.1037/a0030457
- Gao, Y., Zhang, W., & Fung, A. L. (2015).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in Hong K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6), 463–471. doi: 10.1002/ijop.12104.
- Greenfield, P. M. (2009). Linking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Shifting pathways of hum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2), 401–418. doi: 10.1037/a0014726
- Hou, J., Jia, K. K., & Fang, X. Y. (2024). Trend analysi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couples in the past 20 year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895–910.
- [侯娟, 贾可可, 方晓义. (2024). 近20年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发展趋势与社会变迁. *心理学报*, 56(7), 895–910.]
- Hu, J., & Zhou, X. H. (2024). Life course, life transition and psychological transmutation in changing times: Oral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ciologists of the “Educated Youth” gener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964–976.
- [胡洁, 周晓虹. (2024). 变迁时代的生命历程、人生转折与心理嬗变——“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史与集体叙事. *心理学报*, 56(7), 964–976.]
- Huang, Z., Wang, J., Su, Z., Jing, Y. & Cai, H. (2021).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its enlightenments to psychologist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12), 2246–2259.
- [黄梓航, 王俊秀, 苏展, 敬一鸣, 蔡华俭. (2021).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及其对心理学家的启示. *心理科学进展*, 29(12), 2246–2259.]
- Huntsinger, C. S., & Jose, P. E. (2009).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acceptance and control and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in Chinese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3), 321–330. doi: 10.1037/a0015812
- Ip, K. I., Felt, B., Wang, L., Karasawa, M., Hirabayashi, H., Kazama, M., Olson, S., Miller, A., & Tardif, T. (2021). Are preschoolers' neurobiological stress systems responsive to culturally relevant contex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7), 998–1010. doi: 10.1177/0956797621994233.
- Jose, P. E., Huntsinger, C. S., Huntsinger, P. R., & Liaw, F.-R. (2000). Parental values and practices relevant to young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6), 677–702.
- Ju, S. G., Chen, X., Chen, L., Zhao, S., & Fegley, S. G. (2021). Relations of maternal power assertion and autonomy support with children's adjustment in Korea.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5(3), 335–344. doi: 10.1037/fam0000720
- Kagan, J. (1998). Biology and the child. In W. Damon & N. Eisenberg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pp. 177–235). John Wiley & Sons, Inc.
- Kağıtçıbaşı, C. (2012). 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integrative syntheses in human development: Autonomous-related self and social-cognitive competenc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1), 5–11. doi: 10.1111/j.1750-8606.2011.00173.x
- Kho, C., Main, A., Chung, S., & Zhou, Q. (2019). Intrusive parenting in Chinese American immigrant families: Relations with 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4), 341–350. doi: 10.1037/aap0000165
- Kim, K. W. (2006). Hyo and parenting in Korea. In K. H. Rubin & O. B. Chung (Eds.), *Parenting beliefs, behavior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pp. 207–222).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 Lan, X., Legare, C. H., Ponitz, C. C., Li, S., & Morrison, F. J. (2011). Investigating the links between the subcomponents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reschool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08(3), 677–692.
- Liu, J., Chen, X., Coplan, R. J., Ding, X., Zarbatany, L., & Ellis, W. (2015). Shyness and unsociability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adjustment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childre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3), 371–386. doi: 10.1177/0022022114567537
- Liu, X., Fu, R., Li, D., Liu, J., & Chen, X. (2018).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s and adjustment in urban and rural Chi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9(9), 1440–1456. doi: 10.1177/0022022118795294
- Luria, A. R. (1976).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ccoby, E. E., & Martin, J. A.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 H. Mussen (Series Ed.) & E. M. Hetherington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4th ed., Vol. 4., pp. 1–101). NY:

- Wiley.
- Mullis, I. V. S., Martin, M. O., & Foy, P. (2008).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Chestnut Hill, MA: TIMSS &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Boston College.
- Ng, F. F.-Y., Pomerantz, E. M., & Lam, S.-f. (2007). European American and Chinese parents' responses to children's success and failure: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respons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5), 1239–1255.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43.5.1239>.
- Oyserman, D., Coon, H. M., & Ki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3–72. doi: 10.1037/0033-2909.128.1.3
- Rogoff, B. (2003). *The cultural nature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thbart, M. K. (2011). *Becoming who we are: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i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Guilford.
- Sabbagh, M. A., Xu, F., Carlson, S. M., Moses, L. J., & Lee, K.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theory of mind: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S. preschool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 74–81. doi: 10.1111/j.1467-9280.2005.01667.x
- Schirmbeck, K., Rao, N., & Maehler, C. (2020).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s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9(1), Article e2164. doi: 10.1002/icd.2164
- Shen, J. J., Cheah, C. S. L., & Yu, J. (2018). Asi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emerging adults'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s and self-regulation ability.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9(2), 140–148. doi: 10.1037/aap0000099
- Silbereisen, R. K., & X. Chen (Eds.),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results*. London, England: Sage
- Silbereisen, R. K., Piquart, M., & Tomasik, M. J. (2010). Demands of social change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Results from the Jena study. In R. K. Silbereisen & X. Chen (Eds.),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results* (pp. 125–147). London, England: Sage
- Stewart, S. M., Bond, M. H., Kennard, B. D., Ho, L. M., & Zaman, R. M. (2002). Does the Chinese construct of guan export to the W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2), 74–82. doi: 10.1080/00207590143000162
- Tamis-LeMonda, C. S., Way, N., Hughes, D., Yoshikawa, H., Kalman, R. K., & Niwa, E. Y. (2008). Parents' goals for children: The dynamic coexistenc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cultures and individuals: Topic review. *Social Development*, 17(1), 183–209.
- Volbrecht, M. M., & Goldsmith, H. H. (2010). Early temperamental and family predictors of shyness and anxie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6(5), 1192–1205. doi: 10.1037/a0020616
- Wang, Q. (2022).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cultural context: Lessons from Asian-heritage families. *Social Development*, 32(2), 517–526. <https://doi.org/10.1111/sode.12658>
- Wang, X. K., Xin, Z. Q., & Hou Y. (2024).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es of changes and macro causes in moral disengagement amo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859–875
- [王祥坤, 辛自强, 侯友. (2024). 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及宏观成因. *心理学报*, 56(7), 859–875]
- Wu, M. S., Wang, Y. L., & Peng, K. P. (2024). More utilitarian and less rational? Social change and two types of individualism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n China.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911–925.
- [吴胜涛, 王予灵, 彭凯平. (2024). 理性式微、功利扩张? 近 40 年中国社会两种个人主义的变迁. *心理学报*, 56(7), 911–925.]
- Xu, Y., Farver, J. A. M., Yu, L., & Zhang, Z. (2009). Three types of shy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the relation to effortful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6), 1061–1073. doi: 10.1037/a0016576
- 翟学伟. (2005). *人情, 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北京大学出版社.
- Zhang, L., & Zhang, W. X. (2024). Utility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aspi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ree birth cohor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926–937.
- [张良, 张文新. (2024). 过去 20 年城乡高中生的教育效用与教育志向: 基于三个出生队列的历史比较研究. *心理学报*, 56(7), 926–937.]
- Zhang, M. Y., Yang, Y., Bao, H.-W.-S., & Cai, H. J. (2024). The positive ideal affect of Chinese people: Trends over the past decade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7), 847–858.
- [张明杨, 杨盈, 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4). 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 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心理学报*, 56(7), 847–858.]
- Zhang, Z., & Xu, Y. (2019). Implicit theories of shyness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9(1), 200–210. doi: 10.1002/ejsp.2510
- Zhong, B. L., Ding, J., Chen, H. H., Li, Y., Xu, H. M., Tong, J., ... Zhu, J. H. (2013). Depressive disorders among children in the transforming China: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prevalence, correlates, and service us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30(9), 881–892. doi: 10.1002/da.22109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ntext: A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Xinyin CHE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104, USA)

Abstract

The ongoing social change in China may promote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new values, which like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s and development. Different values may serv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human development, helping individuals achieve personal goals and develop social connectedness. From 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the exposure to and integration of diverse values and lifestyles during social change may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new qualities and competencies that allow them to function flexibly and effectively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ocial interactions at the group level, particularly the evaluation and regulation processes based on changing cultural norms and values, are an important context that shapes the display of specific behaviors and their functional meanings or significance and are a main mechanism for the impact of social change on huma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s issue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show initial biases in reactivity, self-regulation or -control, and other temperamental characteristics,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how they interact with their environments in specific manners. Chinese children display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yea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later behaviors, such as compliance and shyness. At the same time, traditional Chinese group-oriented culture, particularly Confucian principles such as the doctrine of filial piety, play a major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socialization goals and practices, such as care-based power-assertive parenting. Social change has influenced and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patterns,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various domains from these two starting poin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social change; human development; the pluralist-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